DOI:10.20069/j.cnki.DJKX.2026007

“族旺返原籍”: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

马草原[1],倪修凤[1],李清彬[2]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

移动端阅读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乡。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并探讨宗族力量如何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宗族力量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原籍地区宗族力量强度越高,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大;家乡认同和特殊信任是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两个重要途径;宗族力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族力量对男性个体、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以及山区地区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构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机制、加强宗族组织的引导和规范、提升农民工家乡认同与特殊信任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宗族力量;农民工返乡;家乡认同;特殊信任;社会资本;乡村振兴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6(01)-0061-14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交通运输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等条件显著改善;同时,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为农民工返乡提供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以及创业培训等政策便利和创业保障,促使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农民选择返乡就业创业。根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到2025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预计超过1 500万人,其中农村创业带头人100万人①;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1 430万人②。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村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社会资本,在乡村发展与治理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对促进农民工返乡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社会遗留的依赖宗族力量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仍发挥着显著作用[1]。农民工返乡不仅得益于国家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也深受“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宗族文化与家乡强宗族力量的影响。一方面,宗族文化普遍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通过家谱、祠堂以及宗族组织等文化载体,强化宗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等以及回报家乡的动机,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另一方面,宗族构成的强连带奠定宗族成员间彼此信任的基础,有利于个体利用宗族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缓解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与资源约束,降低交易风险、促进民间借贷,为农民工返乡后开展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和交易机会,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119)。

作者简介:马草原,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倪修凤,女,通信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电子邮箱为4121119045@stu.xjtu.edu.cn;李清彬,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与收入分配。

① 参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7/content_5670819.htm。

② 参见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509/18/WS68cb965ca310f07257749188.html。

现有文献中，以人口学为基础的“推拉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现象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具体到农民工返乡，城市推力与农村拉力被大量文献视为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因。一方面，从城市角度出发，城市落户难、公共服务不均等、就业与生活成本高以及就业竞争激烈等因素形成推力，使得农民工被迫离开城市[3]；另一方面，从农村角度考虑，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家人团聚与照料需求、生活成本低以及生态环境良好等因素形成拉力，吸引农民工回流家乡[4]。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5]、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以及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7]等方面均发挥着显著作用，对乡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作为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中国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群体最主要的存在形式[8]。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宗族既可以是“实体的宗族”，又能够被理解为“观念的宗族”。一方面，“实体的宗族”意味着宗族既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藉由祠堂、族谱以及祖墓等具有祖业权性质的物质符号去观察宗族力量的衰落与兴盛[2]，同时它也是具有功能意义的组织实体，宗族组织的网络密度与制度结构在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性意义[9]。另一方面，“观念的宗族”表明宗族既是一种涵盖血统、身份以及伦理等要素的“制度文化”，多见于宗族祖墓、族产管理以及财产继承等宗法制度发展与延续的研究中[10]，同时它也是一种包含宗族意识、血脉亲情以及祖先认同等要素的“观念文化”，传统的“敬祖”与“孝悌”等观念仍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对村民美德教育的功能[11]。现有研究表明，宗族力量对移民就业、地权稳定、农民创业以及村庄收入分配等方面均能够产生积极影响[1,9]，在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显著的助益作用。

已有文献中，宗族力量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宗族力量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构建的宗族作为中国农村地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发挥着“传帮带”、风险分担以及缓解信贷约束等重要作用，推动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2,12]。然而，鲜有文献将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结合起来，研究宗族力量如何影响农民工返乡。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首次探究并确证宗族力量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既丰富宗族力量能够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的相关研究，又拓展农民工返乡的研究领域。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升研究的全面性和可信度。第三，倡导政策制定者在优化城乡劳动力空间配置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影响，进而发挥出宗族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强连带：宗族力量与劳动力流动

通过“互动的频率”“情感密度”“熟悉程度”以及“互惠交换”四个维度，Granovetter[13]将人与人之间因相互接触、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纽带关系划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即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率较高、情感较深、相对熟悉以及互惠交换较多的社会网络关系称之为强连带，反之则为弱连带。中西方社会网络中关于强弱连带的重要性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原因是绵延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与植根于欧美社会制度文化情境的“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系统差异。在西方，由于个人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较强，原子化及个体主义的“离散性”家庭建构模式促使个人通过结社形式获取社会资源，以增强个人的社会资本及其竞争力。然而，中国社会建立在宗法制与家本位等传统观念之上，长期以来将人际关系作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指导原则。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强连带。费孝通[8]认为，中国乡村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奉行情、义、信、礼等社会性法则和伦理规范，在强大的家族观念熏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等鲜明特征的差序格局。宗族成员之间形成了强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相比弱连带，强连带在中国人情社会中更具有影响力[14]。

宗族所构成的强连带通过“传帮带”、风险分担以及缓解信贷约束等渠道直接作用于劳动力流动，促

进农民工返乡。一方面，宗族力量有助于促进宗族成员内部的就业资源与信息共享，发挥“传帮带”的先驱效应，帮助其他宗族成员寻找工作[12]，同时也能够促进农民工返乡。边燕杰等[15]调查发现，在职业流动者中，76.8%的被访者使用社会网络机制找到工作，其中高达86.9%的被访者使用了朋友和亲属关系的强连带。特别是在农民工选择返乡的意愿形成与作出决策过程中，外出务工的农民更依赖通过宗族成员来获取与返乡相关的信息与资源。身处外地的农民工很难直接获知家乡关于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信息，只能通过当地亲属以及邻里、街坊等宗族成员间接了解，从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当地亲属以及邻里、街坊等宗族成员对地方政策内容的解读更为透彻，甚至能够提供一些政策文本之外的消息，提高了信息质量，进而推动农民工返乡。另一方面，宗族所构成的强连带奠定了宗族成员之间彼此信任的基础，有益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促进民间借贷；围绕宗族而产生的赠送或往来礼金，更能够为宗族成员的流动提供一种社会保险，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2]。宗族成员间的高度信任与密切合作，增强了宗族成员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降低了农民工返乡的心理成本，从而促进农民工返乡。

综上所述，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构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强连带，通过“传帮带”、风险分担以及缓解信贷约束等渠道直接作用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宗族文化更为浓厚的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力量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会更大。

（二）“事件团结”：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

涂尔干[16]提出两种社会团结模式：基于共同情感和信仰的“机械团结”，以及基于劳动分工和资源交换的“有机团结”。具体到农民工返乡，乡村振兴战略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群体选择返乡。驱动这一现象的团结机制为何？是依赖国家权力保障的机械团结，还是源于技术人才、企业家、社会组织与农民等主体劳动分工、市场导向的有机团结？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代劳动分工的加剧预示着有机团结是促进农民工返乡进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向[17]。也有观点指出单纯依靠市场分工的有机团结难以有效推动农民工返乡[18]。

事件团结整合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强调两者相辅相成推动事件团结再生产。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都是一种静态的属性概念，应考虑社会团结的动态过程性。中国农村地区社会关系呈“原子”状态，村民犹如分散在电路上的“铁矿砂”，宗族或行政组织如同“电路”，当分散的个体遭遇冲击时，就如同电流流入电路，“铁矿砂”之间便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10]。田原史起[19]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事件团结，即村民在特定冲击下将临时团结，冲击消退又恢复“原子”状态。因此，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首先应确定具体事件，再动态观察其中村民如何建立“关系”，如何“团结”，又是如何恢复“原子”状态。

事件团结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秩序解释机制，强调事件触激下的集体行动，揭示了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基本原理。乡村振兴是关乎村民群体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共同富裕的大事件，需要广泛团结共同奋斗。农民工选择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不仅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还受宗族文化和宗族力量影响选择回乡建设。宗族以血缘、地缘为纽带，通过宗族构建的关系更为紧密牢固，有助于实现宗族成员之间跨越区隔，进而积极推动农民工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形成事件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这一大事件中，广大村民群体基于宗族构建紧密的关系，农民工作为事件中的参与者，受关系的影响与号召，将更积极高效地参与到事件中，形成事件团结，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宗族力量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促进作用。

（三）家乡认同：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认同机制

社会认同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关键前提，在个体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成员在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日益增长的信息社会中，依然具有强烈的寻求归属于群体、共同体以及组织的内在需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中归属与认同的需求，位于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之上，凸显了认同感对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处群体产生认同，对群内成员给予积极评价、信任和支持，同时认识到群体赋予的价值诉求与情感意义及其带来的信息与资源优势[20]。因此，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有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对于个体而言，宗族力量能够提升成员对宗族的“内源性认同”和“功能性认同”，进一步增强家乡认

同。“内源性认同”基于与家属、亲戚等血缘群体以及邻里、街坊等地缘群体相关的礼俗社会的“人情”原则，主要指宗族成员利用并强化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构建的宗族，以满足个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情感需求，强调的是宗族成员对宗族情感层面的认同[10,20]。“功能性认同”则基于利己主义和契约安排等构成的法理社会的“理性”原则，指宗族成员利用并借助宗族寻求强连带的社会支持以谋取利益，对宗族的认同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10,21]。因此，无论是“内源性认同”还是“功能性认同”，都体现出宗族力量对提升宗族成员家乡认同的强化作用，增强宗族成员对家乡的偏爱和责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回报家乡和维系在家乡良好声誉的动机。

宗族文化所传达的“认祖归宗”“落叶归根”以及“光宗耀祖”等祖先认同和血脉亲情观念，形成了农民工浓厚的家乡认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家乡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既体现了农民工对家乡自然环境、亲戚与朋友联结的情感依恋，又意味着农民工希望享有宗族带来的信息与资源优势[20]。从情感依恋的角度来看，长期在外漂泊的农民工更加渴望得到家乡提供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无论是“落叶归根”的宗族文化，还是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都厚植了农民工的乡土情怀，往往会激发出农民工更强的返乡动机，以释放其浓厚的思乡情感。从信息与资源优势的角度来看，家乡普遍存在农民工早期基于宗族建立的稳固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农民工获取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且可靠的信息和资源。一方面，通过宗族成员了解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的信息，农民工在乡土情结的推动下会选择返乡就业，加入建设家乡的队伍；另一方面，考虑到家乡基于宗族建立的稳固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资源优势，有条件的农民工会利用在外积累的资金、技术与工作经验，选择“衣锦还乡”，在返乡创业的基础上实现“光宗耀祖”的道德声誉[22]。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宗族力量能够增强农民工的家乡认同，进而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促进作用。

（四）特殊信任：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信任机制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发挥着风险分担、提高效率以及促进合作等关键作用，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共同被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依据差序格局和信任半径理论，社会信任可以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23-24]。特殊信任依赖血缘、地缘等关系或密切的社会交往，建立在家族关系、私人关系之上，其对象主要包括有血缘、婚姻或地缘关系的人，如家属、亲戚等血缘群体以及邻里、街坊等地缘群体；普遍信任不依赖特定社会联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并非指向特定对象的信任，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群体之间，如陌生人。由于信任群体的差异性，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24-25]。综合来看，特殊信任能够作为中介帮助个体与其他关系网络取得联系，进而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缓解信息约束和资源约束。

宗族是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关系共同体，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村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宗族成员之间互助互惠并共担风险，其内嵌的声誉激励机制与道德约束机制能够有效提高成员间的信任水平[20]。因此，特殊信任往往被视为获取信息资源、降低风险并开展经济活动的工具。一方面，特殊信任能够帮助个体通过宗族强连带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和资源，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多的交易机会，从而缓解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约束和资源约束；另一方面，特殊信任基于对借贷者的高度信任，有效缓解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开展，进而为个体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信贷约束[23-24]。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依赖血缘、地缘等关系纽带形成的宗族，因而以宗族成员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信任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虽然部分农民工在外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技能[26]，但身处外地的农民工难以直接获知家乡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信息，通过当地亲戚以及邻里、街坊等宗族成员间接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另一方面，返乡地方政策由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发展情况定制，各地对本地村民返乡就业创业会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补贴等扶持，当地亲戚及邻里、街坊等宗族成员对政策内容解读更为透彻，甚至能够提供政策文本之外的非正式信息，进而提高信息质量[23]。综上所述，以宗族成员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信任有助于促进民间借贷、降低交易成本，为农民工返乡后开展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和交易机会等资源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宗族力量能够提升农民工对原籍地区的特殊信任，进而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促进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8年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调查涵盖全国28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海南以及新疆)，共完成了368份村居社区问卷，13 501份家庭问卷和16 537份15～64岁以及6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具有较好的全国和区域代表性。本文研究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主题，故提取农村居民和村庄数据，并剔除村庄和农户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同时，将个体问卷与村居问卷的统计数据进行匹配，形成包含个体和村级特征的完整数据库。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涵盖26个省份、208个村庄和9 725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返乡。根据CLDS数据，选取现居住在户籍地的农村劳动力，以其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对个体的返乡情况进行赋值：有外出务工经历赋值1，反之赋值0，以此作为农民工返乡的代理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宗族力量。现有研究多以村庄第一大姓氏是否有宗族组织来衡量宗族力量强度，该指标可反映宗族成员关系的亲疏远近或凝聚力的强弱[9]。宗族组织的存在往往伴随着集体仪式或集体活动，是宗族集中成员力量并实施非正式社会安排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增强宗族成员间的信任与凝聚力。宗族组织是宗族号召农民工返乡进而影响基层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有研究表明，宗族的组织性在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缓解信息不对称及信贷约束等方面表现出色，同时对农民增收、乡村发展及其治理具有显著促进作用[9]。因此，本文选取村庄第一大姓氏是否有宗族组织来衡量该村庄的宗族力量强度，用以刻画宗族的组织性与凝聚力。

本文选取个体与村庄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数量、总收入及工资收入；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涵盖村庄的实际居住人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非农产业经济数量、村集体财政收入、本村行政区域内企业数(不含商店和超市)、最近快递/物流/寄取点到村委会的距离及村庄人均年收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反映村庄劳动力结构，非农产业经济数量衡量村庄产业结构，村集体财政收入与本村行政区域内企业数(不含商店和超市)体现村庄经济发展状况，最近快递/物流/寄取点到村委会的距离表征村庄生活便利程度。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民工返乡	现居住在户籍地的农村劳动力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1=有，0=没有	0.169	0.375
宗族力量	村庄第一大姓氏是否有宗族组织：1=有，0=没有	0.220	0.415
性别	1=男，2=女	1.516	0.500
年龄	单位：岁	47.957	14.557
受教育程度	1=未上过学，2=小学/私塾，3=初中，4=普通高中，5=职业高中，6=技校，7=中专，8=大专，9=本科，10=硕士，11=博士	2.784	1.600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2=民主党派，3=群众	2.923	0.385
健康状况	1=非常健康，2=健康，3=一般，4=比较不健康，5=非常不健康	2.471	1.038
婚姻状况	1=未婚，2=初婚，3=再婚，4=离异，5=丧偶，6=同居	2.053	0.771
兄弟姐妹数量	如果为独生子女，则填0，单位：位	3.370	2.049
总收入	各类收入总计(包括农业收入、工资收入、经营收入等，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需按市场价值折算成收入)，单位：万元	2.495	2.997
工资收入	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后的工资性收入(包括所有的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单位：万元	1.271	2.305

表1（续）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村庄实际居住人口	村庄实际居住人口，单位：人	2 799.731	2 785.822
村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	常年居住在本村庄的劳动力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例，单位：%	65.388	31.355
村庄非农产业经济数量	本村的非农产业经济数量，单位：种	0.484	0.998
村集体财政收入	村集体财政收入，单位：万元	45.044	98.352
村庄企业数	本村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数（不包括商店和超市），单位：家	13.723	32.496
村庄物流服务设施邻近度	距离本村庄最近的快递/物流/寄取点到村委会的距离，单位：千米	5.412	13.639
村庄人均年收入	本村庄（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单位：万元	1.389	1.893

注：村庄层面的样本观测值为208，个体层面的样本观测值为9 725。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说1，即宗族力量是否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本文使用如下回归方程考察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F_{ij}=\beta_0+\beta_1 Z_j+\beta_2 X_i+\beta_3 X_j+\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F_{ij}表示村庄j中个体i的返乡情况，由户籍地农村劳动力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刻画；Z_j表示村庄j的宗族力量强度，通过村庄第一大姓氏是否有宗族组织衡量；X_i表示个体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X_j表示村庄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β_0为常数项，β_1、β_2、β_3均为待估计系数，β_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ε_{ij}为随机扰动项。此外，在所有回归中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政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典型的虚拟变量，服从两点分布，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系数表示平均边际效应。同时，由于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可直接从系数得到较为直观的结果，本文选用OLS模型进行估计。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原籍地区宗族力量强度越高，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高，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1。OLS模型与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符号无差异，系数大小相近，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正如理论分析所述，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构建的宗族构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强连带，通过“传帮带”、风险分担以及缓解信贷约束等渠道直接作用于劳动力流动。

表2 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	农民工返乡					
	（1）OLS	（2）OLS	（3）OLS	（4）Logit	（5）Logit	（6）Logit
宗族力量	0.047***	0.052***	0.046***	0.042***	0.049***	0.043***
	（0.011）	（0.011）	（0.011）	（0.010）	（0.010）	（0.010）
个体层面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村庄层面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9 275	9 275	9 275	9 275	9 275	9 275
R^2或Pseudo R^2	0.047	0.080	0.085	0.050	0.088	0.094

注：1.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稳健标准误。

3. 使用OLS模型估计时，汇报R^2；使用Logit模型估计时，汇报Pseudo R^2。

（二）稳健性检验①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更好地衡量宗族力量，重新构建测量指标。参考陈斌开等[1]的方法，首先，考虑村庄宗族组织数量，将村庄存在两个及以上宗族组织赋值1，一个及以下宗族组织赋值0；其次，以是否有族谱衡量村庄宗族力量强度，将村庄第一大姓氏有族谱赋值1，没有赋值0；最后，以村庄第一大姓氏占总人口比例衡量村庄宗族力量强度，再次探究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采用上述三项指标重新回归，结果显示，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原籍地区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高，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2.剔除65岁以上且仍在工作的样本

普遍而言，劳动力年龄范围界定为15～64岁。因此，从总样本中剔除65岁以上且仍在工作的样本，重新估计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原籍地区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再次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剔除农村留守劳动力

农村留守劳动力指一直留守在农村地区，未选择外出流动的劳动力，不存在返乡的可能，将其纳入对照组可能导致估计偏差。因此，从总样本中剔除该样本后重新估计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原籍地区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再次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五、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家乡认同

宗族文化所传达的“认祖归宗”“落叶归根”以及“光宗耀祖”等祖先认同和血脉亲情观念，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家乡认同，进而吸引其返乡。家乡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主要体现在对家乡公共事务的群体参与认同，以及对家乡传统习俗与社交礼仪的文化认同[20]。一方面，当村庄组织修路、建学校、建养老院或文化广场等集体活动时，无论是留守村民，还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均可能出于对家乡的认同而以提供劳力或捐款等方式积极参与。社会规范理论认为，共享合作规范的群体在互助互惠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能够引导群体成员自我约束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此，积极参与家乡公共事务既体现了村民对家乡群体认同，也有助于增强村民的家乡认同[27]。另一方面，村民普遍遵循传统习俗与礼仪规范，如婚丧嫁娶等群体活动中的“随份子”等送礼行为，既反映了对家乡传统习俗的文化认同，也体现了村民的家乡认同。

基于此，本文选取相应指标测度村民的家乡认同。一方面，采用个体问卷中“假如村里组织修路，需要劳力/资金，你是否愿意参加/捐款”测度村民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27]。答案选项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依次赋值1～5，数值越大表明参与意愿越强。另一方面，采用“村里亲戚朋友办喜事，你会去送礼吗”测度村民对家乡地区的传统习俗与社交礼仪的文化认同。答案选项从“极少会去”到“全部都去”依次赋值1～4，数值越大表明送礼可能性越高。同时，为反映宗族力量影响个体家乡认同的重要性，本文还选取“村里其他人（不是亲戚朋友）办喜事，你会去送礼吗”作为对照，以比较送礼对象差异对送礼行为的影响。答案选项从“极少会去”到“全部都去”依次赋值1～4，数值越大表明其他人（不是亲戚朋友）之间送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家乡认同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3，分别以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以及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三个变量表征家乡认同。第（1）（2）列报告了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

① 篇幅限制，结果留存备索。

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宗族力量对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宗族力量越强,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意愿越高、家乡认同感越强。这与宗族内嵌的声誉激励机制和道德约束机制密切相关[20]。为获得村民群体特别是宗族成员的赞许与认可,并为自身及所属宗族赢得良好声誉,村民普遍选择积极参与家乡公共事务。同时,宗族发挥重要的道德约束作用,能够有效遏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规制村民行为方式并调动其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此,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能够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桥梁与黏合剂作用,不断提升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其对家乡的群体认同,进而强化家乡认同[27]。第(2)列加入宗族网络与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结果显示宗族力量越强,村民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意愿越高、家乡认同感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也越高。

表3 家乡认同的作用机制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参与家乡公共事务	(2)农民工返乡	(3)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	(4)农民工返乡	(5)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	(6)农民工返乡
宗族网络	0.120***	0.043***	0.049*	0.045***	−0.076***	0.047***
	(0.023)	(0.011)	(0.026)	(0.011)	(0.028)	(0.011)
参与家乡公共事务		0.027***				
		(0.005)				
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				0.040***		
				(0.004)		
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						−0.011***
						(0.004)
观测值数	9 250	9 250	9 250	9 250	9 250	9 250
R^2	0.064	0.089	0.102	0.094	0.156	0.086

注:1. *和***分别表示10%和1%的显著性水平。

2. ()内为稳健标准误。

3. 个体、村庄和省份层面固定已控制,控制变量结果留存备索。

表3第(3)~(6)列报告了亲戚朋友与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的机制检验结果。其中,第(3)(5)列分别报告了宗族力量影响两类送礼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宗族力量对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对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可能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村庄宗族力量越强,亲戚朋友之间送礼的可能性越大,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的可能性越小,从侧面反映出村民的家乡认同感越强。这符合中国的现实逻辑,人情随礼既是情感表达、传递心意的方式,也是社交礼仪和传统文化。因此,村庄宗族力量越强,亲戚朋友之间送礼的可能性越大。

相比之下,非亲戚朋友之间形成的是弱连带,不需要刻意维系关系。短信任半径理论也支持这一观点,差序格局、族内团结等特征会缩短宗族成员的信任半径,导致其对族外人员信任水平下降,进而减少族内成员与族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23-24]。因此,宗族力量越强,非亲戚朋友之间送礼的可能性越小。综合来看,宗族力量能够增强村民对家乡地区传统习俗与社交礼仪的文化认同,进而强化其家乡认同。第(4)(6)列分别加入宗族网络与两类送礼可能性,结果显示宗族力量越强,亲戚朋友间送礼可能性越大,非亲戚朋友间送礼可能性越小,进一步表明村民家乡认同感越强,越能吸引农民工返乡。

综上所述,宗族力量能够增强村民对家乡公共事务参与的群体认同以及家乡地区传统习俗与社交礼仪等文化认同,进而提升其家乡认同。如理论分析所述,家乡认同既体现了农民工对家乡自然环境、亲属朋友联结的情感依恋,也意味着农民工希望享有宗族带来的信息与资源优势[20]。鉴于此,更多农民工选择"衣锦还乡",在改善家乡环境、扶持家乡发展、回报家乡基础上实现"光宗耀祖"的道德声誉[22]。总体说来,宗族力量能够增强农民工的家乡认同,进而对其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2。

(二)特殊信任

如理论分析所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宗族力量较为强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亲疏远近""内外有别"为特征的差序格局,因而以宗族成员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信任通常具有较高水平。宗族成员间的特殊信任

能够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信息与资源获取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大。同时，为与特殊信任形成对照，本文考察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的普遍信任，研究宗族力量是否会通过影响普遍信任进而对农民工返乡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取相应指标测度村民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一方面，鉴于熟悉是信任建立的基本前提，采用个体问卷中“您和本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测度村民对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熟悉程度。答案选项从“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依次赋值1～5，取值越高表明熟悉程度越高。同时，采用“您对本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反映村民对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信任程度，答案选项从“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依次赋值1～5，取值越高表明信任程度越高。基于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两个测量指标，共同检验宗族力量对村民特殊信任的影响。另一方面，采用“对于陌生人，您的信任程度怎样”测度村民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答案选项从“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依次赋值1～5，取值越高表明信任程度越高，以此衡量宗族力量对村民普遍信任的影响。

特殊信任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4，分别以邻里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两个变量共同表征特殊信任，以陌生人信任程度表征普通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回归结果形成对照。第(1)～(4)列报告了邻里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其中，第(1)(3)列分别报告了宗族力量影响邻里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宗族力量对邻里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村庄宗族力量越强，村民对邻里的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越高。这也符合中国的现实逻辑，无论是家人与亲戚构成的血缘群体，还是邻里与街坊构成的地缘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都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人情随礼、祭祖扫墓等集体活动增进了宗族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因而彼此之间十分熟悉且高度信任。综合来看，宗族力量能够增强村民对邻里的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进而提升村民的特殊信任。第(2)(4)列分别报告了将宗族网络与邻里熟悉程度、信任程度共同加入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村庄宗族力量越强，村民对邻里的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越高、特殊信任越强，越能够吸引农民工返乡。

表4第(5)列报告了村民对普遍信任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宗族力量对村民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且系数大小仅为0.014，表明宗族力量未对村民普遍信任产生显著影响。这符合理论预期：依据社会信任理论概念界定，以宗族成员为主要对象形成的是特殊信任，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形成的是普遍信任，因此宗族只会影响村民的特殊信任，而对普遍信任几乎不会造成影响。这也证实了宗族力量提升的是村民的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

表4　特殊信任的作用机制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邻里熟悉程度	(2)农民工返乡	(3)邻里信任程度	(4)农民工返乡	(5)陌生人信任程度
宗族网络	0.046*	0.046***	0.032*	0.047***	0.014
	(0.024)	(0.011)	(0.018)	(0.011)	(0.026)
邻里熟悉程度		0.017***			
		(0.005)			
邻里信任程度				0.010**	
				(0.005)	
观测值数	9 266	9 266	9 266	9 266	9 266
R^2	0.094	0.087	0.097	0.086	0.045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稳健标准误。

3.个体、村庄和省份层面固定已控制，控制变量结果留存备索。

宗族力量能够提高对邻里的熟悉程度与信任程度，进而提升其特殊信任。如理论分析所述，宗族成员间产生的特殊信任能够在信息与资源获取等方面为农民工返乡提供支持。一方面，身处外地的农民工通过当地亲戚及邻里、街坊等宗族成员间接了解家乡关于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信息，从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信息质量[23]。另一方面，以宗族成员为主要对象形成的特殊信任有助于促进民间借贷、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农民工返乡后开展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与交易机会等资源支持。综上所述，宗族力量能够提升农民工的特殊信任，进而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促进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3。

六、拓展分析

(一)性别的异质性影响

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宗族观念深入人心。鉴于此,本文展开性别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2)列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原籍地区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可能性越高。其中,男性与女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7和0.043,说明男性农民工更有可能受宗族力量影响而返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原因,男性农民工更有可能因赡养父母、继承家业以及“落叶归根”等原因而选择返乡;另一方面,女性农民工回村后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任务,导致劳动供给不稳定,进而影响其经济收益及家庭收入,因此女性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留在外地。

表5 性别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农民工返乡					
	(1)男性	(2)女性	(3)垄断型	(4)非垄断型	(5)山区	(6)非山区
宗族力量	0.047***	0.043***	0.081***	0.030**	0.127***	0.040***
	(0.018)	(0.014)	(0.025)	(0.015)	(0.040)	(0.013)
观测值数	4 490	4 785	3 044	6 231	2 150	7 125
R^2	0.079	0.075	0.116	0.095	0.132	0.089

注:1. **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稳健标准误。

3. 个体、村庄和省份层面固定已控制,控制变量结果留存备索。

(二)宗族网络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的宗族网络结构影响着村庄内部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与协调成本。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意味着宗族力量较为强大,对成员控制程度较高,成员乃至村民之间的协调成本较低,易于达成集体行动;而寡头型或均匀型等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则意味着宗族力量相对弱小,村庄内少数几个宗族实力近乎均等或缺乏能影响全村的大姓,对成员控制程度较低,协调村内集体行动的成本较高,不易达成一致行动。借鉴王宇峰[28]的做法,将宗族网络结构划分为垄断型和非垄断型两类。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定义为村庄第一大姓氏占比大于等于30%且大于第二大姓氏2倍的情形,这保证第一大姓氏具有压倒性优势;其他村庄为非垄断型,即第一大姓氏所占比例大于等于30%且小于等于第二大姓氏的2倍,或第一大姓氏占比小于等于30%。

表5第(3)(4)列汇报了不同宗族网络结构下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垄断型还是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可能性越高。对比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垄断型和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下宗族力量系数分别为0.081和0.030,说明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中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中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该结论与李荣彬[27]关于宗族网络结构越集中,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越高的研究结论一致。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下宗族力量较强,能够提升外流农民工的家乡认同与特殊信任,高水平的认同与信任有助于降低协调成本,促进农民工返乡并形成建设家乡的集体行动;而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缺乏影响全村的宗族力量,外流农民工的家乡认同与特殊信任水平较低,导致协调成本较高,难以吸引农民工返乡。

(三)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对于远离行政中心、地处山区的村庄,宗族是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9]。从逻辑上看,地形越复杂、交通越不便利的地区,受到的行政约束相对较弱。特别是山区,居住环境相对封闭,

与外界交流较少，相对滞后的教育理念与经济发展导致当地村民受宗族力量影响更大。因此，相比非山区地区，从山区走出去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受宗族力量影响而选择返乡。鉴于此，本文展开地形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第(5)(6)列所示。无论山区还是非山区地区，宗族力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宗族力量强度越高，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具体而言，山区与非山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7与0.040，说明相比非山区地区，山区农民工更有可能受到宗族力量的影响而返乡。

七、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强调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引导人才返乡入乡已成为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宗族作为传统中国农村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对农民工返乡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关注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有三点。第一，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原籍地区宗族力量越强，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家乡认同和特殊信任是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宗族力量能够增强农民工对家乡传统习俗与社交礼仪的文化认同及其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群体认同，从而提升家乡认同，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另一方面，宗族力量能够提高农民工对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熟悉程度与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对村民的特殊信任，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第三，宗族力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男性个体、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及山区地区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首先，相比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更易受“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宗族文化影响而选择返乡。其次，相比非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村庄，垄断型宗族网络结构下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相比非山区地区，山区农民工更有可能受“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等宗族文化影响而选择返乡。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机制。在推动乡村振兴特别是人才振兴过程中，考虑中国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充分发挥传统宗族在自治、德治方面的积极作用，弥补行政干预等正式制度在信息传递与组织效率上的不足，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加强宗族组织的引导和规范。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技能培训及金融服务等政策基础上，强化对宗族活动的引导。宗族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在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伦理道德等“德治”方面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具有正式制度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三，提升农民工家乡认同与特殊信任。支持鼓励建立宗族互助基金、信息共享平台以及返乡创业服务网络提升特殊信任水平，重点发挥大姓宗族的组织协调能力，降低农民工返乡的信息与资源约束，有效引导其返乡入乡。

参考文献：

[1] 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J].经济研究，2018，53(3)：35-49.
CHEN B K，CHEN S Y. Flowing social capital：can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affect migrants’ employment in modern socie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8，53(3)：35-49.

[2] 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2013，29(3)：69-81.
GUO Y N，YAO Y. The lineage networks and the migration of the labor for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13，29(3)：69-81.

[3] 张吉鹏，黄金，王军辉，等.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J].经济研究，2020，55(7)：175-190.
ZHANG J P，HUANG J，WANG J H，et al.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Hukou registration reform in Chinese cit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20，55(7)：175-190.

[4] 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9(7)：99-109.
WANG X Y，CUI C Y，ZHAO Y. Jobbing and homing：employment transfer and rural growt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03，19(7)：99-109.

[5] 魏滨辉，罗明忠，曾春影.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39

(10):26-48.
WEI B H, LUO M Z, ZENG C Y. Returning labor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23,39(10):26-48.
[6] 王轶,刘蕾.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2,38(9):44-62.
WANG Y, LIU L. How ca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n rural areas?[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22,38(9):44-62.
[7] YU L, WANG Y R, LI M. The emergence of counter-urbanization in China: can it be a pathwa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24,144:102998.
[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9.
[9] 仇童伟,罗必良."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J].管理世界,2019,35(8):97-109.
QIU T W, LUO B L. Good agents or bad conspirators: the impact of clan on land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19,35(8):97-109.
[10] 向勇.祖荫竞赛:理解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一个中观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1):149-161.
XIANG Y. Zuyin competition: a meso-mechanism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rural clans in China[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2,42(1):149-161.
[11] GREIF A, TABELLINI G.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35-140.
[12] ZHAO Y H.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03,21(4):500-511.
[13]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14]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9,30(3):152-158.
ZHAI X W. Revisiting the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s and theoretical legacies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9,30(3):152-158.
[15]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2(2):77-89.
BIAN Y J, ZHANG W H. Economic systems, social networks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22(2):77-89.
[16]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56.
[17] 李宇征.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心秩序[J].重庆社会科学,2024,42(4):26-36.
LI Y Z. Unbal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mind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J].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2024,42(4):26-36.
[18] 王敬尧,董诗艺.寻找团结:重建乡村共同体的现实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2,45(6):114-121.
WANG J Y, DONG S Y. Seeking solidarity: the realistic logic of rebuilding rural community[J]. Socialism Studies,2022,45(6):114-121.
[19] 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1.
[20] 黄珍,禹媛媛,贾明.衣锦还乡促创新:基于高管家乡认同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22,36(5):111-129.
HUANG Z, YU Y Y, JIA M. Repay hometown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hometown identity of senior executives[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22,36(5):111-129.
[21] 潘越,翁若宇,纪翔阁,等.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J].管理世界,2019,35(7):116-135.
PAN Y, WEN R Y, JI X G, et al. Clan culture and the blood complex of family firm govern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19,35(7):116-135.
[22] 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7,33(3):76-94.
HU J, SONG X Z, WANG H J. Informal institution, hometown identit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17,33(3):76-94.
[23] 张心仪,杨建科.农民个体资本、数字技术使用与生计韧性[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3):

145-155.

ZHANG X Y，YANG J K. Farmers’ individual capital，ICT adoption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4，44(3)：145-155.

[24] 黄实磊，吴翌琳. 信任格局视角下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个体创业的影响研究：兼论地区信任模式的作用[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1)：104-124.

HUANG S L，WU Y L. General trust，particular trust，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trust structure perspective：role of regional trust pattern[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23，44(11)：104-124.

[25] 赵景艳，李旭东. 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基于社会信任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8)：112-126.

ZHAO J Y，LI X D. Particular trust or universal trust：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rust on enterprises’ trans-regional investment[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22，44(8)：112-126.

[26] 郭萌萌，雷文杰. 地区间信任与流动人口创业[J]. 当代经济科学，2025，47(4)：65-79.

GUO M M，LEI W J. Inter-regional trust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25，47(4)：65-79.

[27] 李荣彬. 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治理之道：来自宗族网络的证据与解释[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37(5)：129-138.

LI R B.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from the clan network[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2021，37(5)：129-138.

[28] 王宇锋. 宗族结构、村庄规模与村民收入[J]. 南开经济研究，2010，26(3)：64-72.

WANG Y F. Clan，size and average income in villages：evidence from China[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10，26(3)：64-72.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1] 刘伟江，郝一哲. 数字鸿沟与劳动力再配置：动态效应与效率提升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25，47(3)：18-34.

[2] 康姣姣，吴方卫. 老年父母的真实需求：金钱还是陪伴：农村家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视角[J]. 当代经济科学，2025，47(3)：115-129.

[3] 许长青，李钧宇. 教育与代际流动：职业地位视角的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25，47(1)：91-105.

[4] 崔琳昊，冯烽.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深鸿沟”还是“熨平丘壑”?[J]. 当代经济科学，2025，47(2)：54-65.

[5] 赵宸宇，李炳钰.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24，46(6)：103-115.

[6] 蒲艳萍，袁柏惠，张岚欣.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23，45(4)：111-126.

[7] 曹芳芳，程杰，武拉平，等. 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23，45(1)：103-118.

编辑：郑雅妮，王磊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The Power of the Clan and the Retur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MA Caoyuan[1], NI Xiufeng[1], LI Qingb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Summary A certain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s have migrated to urban areas,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 of rural population deficit and talent exodus. In fact, urbanization requires a continued transfer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to cities, whereas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hasizes the return of talent to rural areas for development. The two strategies therefore present a certain "contradiction"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loss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particularly the outflow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workers, not only weakens the population base fo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even triggers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hollow villages," "aging agriculture," and "landless farmers." This directly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le continuously advancing urbanization,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labor flowing one-way labor flow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and establish smooth two-way channels for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hometown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is two-way flow of labor forc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lan power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clan power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as wa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lan power affects this retur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lan power significantly promotes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he greater the clan's influence in the place of origin,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migrant workers will return home. Hometown identity and special trust are two important pathways through which clan power influences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On the one hand, clan power can strengthen migrant workers' cultural identity towards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social etiquette of their hometowns, as well as their sense of group identity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 of their hometowns. This strengthe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sense of hometown identity and encouraging their return. On the other hand, clan power can enhance familiarity and trust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neighbors, other villagers, and local residents, thus enhancing special trust towards villagers and promoting their retur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lan power mainly influences the return of 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those in monopolistic clan network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ose in mountainous villages. First, male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ha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o be influenced by clan cultures such as "raising sons for old-age support" and "preferring sons over daughters," and thus choos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Second, clan power under monopolistic clan network structures has a stronger promotional effect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an in villages with non-monopolistic clan network structures. Third, migrant worker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clan cultures such as " returning to ancestral roots" and "falling leaves return to their roots" than those in non-mountainous areas, and thus choose to return hom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It is the first to explore and confirm that the power of the clan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his not only enrich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clan power, but also expands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 returns. (2)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clan power on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nd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at play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credibility of the research. (3) It reminds policymaker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 they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clan power on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hereby leveraging the complementary role of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of the clan alongside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lan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in promoti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 two-way flow mechanism for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 and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labor mobility; clan power; retur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ometown identity; special trust; social cap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